

# 八八風災後社區營造凝聚的女性力量： 大鳥部落笆札筏布工坊經驗\*

楊濬瑄、葉淑綾\*\*

## 摘要

位於臺東縣大武鄉大鳥村的笆札筏布工坊，最初是在八八風災後政府及民間資源多方挹注下形成的一個手工藝學習團體，今日已轉型為一個以女性為主體進行運營、販售手工車縫布包聞名的工坊。臺東大學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中心於2019年開始與之進行課程合作，並進行聯合策展，透過課程與策展帶引的田野調查，我們逐步認識布工坊的內部運作與對外連結的脈絡；「外」，意指外於布工坊，所涵括的範疇有部落內部不同的個人與社團，以及部落之外的單位。本篇文章將從展覽內容出發，進入布工坊

---

\* 猶記一開始踏入布工坊時，我們雙方小心翼翼、眼神羞赧交會，到現在總是可以自然地、大剌剌地跟彼此打招呼，不知不覺地，已經認識近五個年頭了。這一篇文章，是布工坊一路走來的故事，從相關報導與論文中梳理、從妳們分享的紀錄而來。布工坊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妳們持續地創造它前進的動能，希望閱讀此篇的大家可以在這裡頭看見妳們，看見以妳們為中心，家／社區／部落如何被想像與創造。以此篇，獻給經理與每一位設計師，以及信任並願意與我們分享故事的族人。也感謝期刊編輯團隊與審查人提供的寶貴建議，讓這篇文章論述得以琢磨完整。最後，因為國科會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MOST110-2420-H-143-001-HS3、NSTC113-2420-H-143-003-HS3）的支持，讓我們有機會認識大鳥部落，並與部落激發各種合作的討論與實作，也才能誕生這一篇文章，期許能為南迴地區族人的實踐之路，留下一頁紀錄。

\*\* 楊濬瑄，國立臺東大學人文學院南島文化研究博士生。  
葉淑綾，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教授；通訊作者，  
E-mail: rainysl@nttu.edu.tw

成立十餘年來發展的經歷，探究它與內、外部社會網絡各種資源的互動消長狀態，如何在內、外領域間做出因時且因地制宜的合作調整，對內凝聚共同意識與共同情感，進而促成不只是布工坊自身的獨立，也讓參與其中的成員能發展出在家庭和工作不同身分間自在切換的能量，可謂一透過內與外組織和資源互動的調和，漸進長出的女性力量。現時期的布工坊，也積極地透過參與地方公共事務，加深與地方的連結，擴展布工坊「內」的邊界範圍，而在此時期與之接觸的臺東大學人社中心，在進行策展活動時以此關切切入，規劃出一場集合布工坊成員、其親友與大學生三方互動的活動，作為一種循序的地方實踐，加入這場地方女性從日常生活中長出的行動力量。

關鍵詞：大鳥部落、芭札筏布工坊、日常生活實踐、大學社會實踐

## 一、前言

位於臺東縣大武鄉大烏村的芭札筏（Pacavalj）布工坊（以下簡稱布工坊），是 2009 年莫拉克風災（又稱八八風災）後，在多方單位協力下成立的一個工坊，由女性擔任主要營運的角色，以販售結合十字繡片的手工車縫布包聞名。2019 年 7 月，為執行科技部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臺東大學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中心成立，中心團隊開始與布工坊接觸，希望促進大學端資源與地方產業組織的對話與合作。彼時的布工坊已是自主營運的事業體，走進其空間，各式包款琳瑯滿目地陳列在架上，搭配設計師們車縫包包的聲音，讓「手工製作」這個印象更真實地烙印在每位訪客的心中。

本篇文章將自東大團隊合作策劃的展覽出發，從回溯展覽緣起及內容架構安排，帶入布工坊自身經歷的故事——它如何成立？有誰參與其中？它與地方女性之間的關係……這個故事本身就是一場在地實踐行動歷程；而在其成立十年後進入與之合作的臺東大學人社中心，在過程中又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接續將分別以「從展覽看見布工坊」、「災後，內外交織出的社造活動」、「從縫紉班開始的聚集：沒薪水領不如回家」、「拒絕政府補助之後，以女性身分『同理』出發的人事管理」、「布工坊女性與家庭」、「留在家裡」、「內與外的調和：從女性日常生活出發」、和「展覽活動：同時是向內也是向外的對話」等節次來逐步介紹布工坊的成長。

## 二、從展覽看見布工坊

臺東大學人社中心以人類學田野調查方法為基礎，研擬出「慢慢來」的共識，期許透過參與觀察和訪談，深入了解地方脈絡與需求，後續再建構出適切的實踐方案。在以田野工作與地方逐步交流的同時，由於東大人社計畫組織中有來自不同領域背景的老師、博士後研究員、專任助理等，因此中心內部啟動了不同形式的活動，規劃不同系所學生的主題參訪、田野實習課程、工作坊等，以便與地方合作對象建立更為頻繁的互動。意即，除了田野工作的基礎，人社中心與地方也在計畫推進過程中透過更多元的互動方式，逐步累積和建構出讓地方故事與地方關懷能出現的情境。

東大人社中心大鳥團隊加強了大學與地方的相互認識與交流，也透過課程安排，在參訪學習的過程中漸次深化與布工坊的合作。我們安排了不同年級、不同科系的學生前往參訪，包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大學部等。布工坊負責人王曉彤經理在面對不同團體時，分享的布工坊故事會有不同的重點，或著重產品風格如何建構、經營策略，有些則著重在自我生命故事敘說。透過多次的交流互動，團隊慢慢梳理出布工坊發展的輪廓。除了當日來回的參訪行程之外，大鳥團隊裡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的葉淑綾老師以及林靖修老師，也透過「田野調查」、「南島語族社會與文化」與「經濟發展與文化」等人類學社會實作相關課程，來與布工坊進行更聚焦的討論與合作，一方面逐步累積地方相關的文史資料和生命敘事，另一方面也鼓勵修課同學自布工坊當前營運現況中，思考可以如何結合自身專長和興趣，提出可執行的實踐方案。老師們並不期待學生們發展出一個完美的方案，而是希望透過這個方式，看見布工坊更多元的面向。

面對已有自成一格運作策略的「營利」單位，同學們一開始顯得有些無所適從。爾後，其中一組學生運用田野調查方法，彙整布工坊的布包款式，嘗試製作商品型錄，並為設計師撰寫人物故事報導；也有學生嘗試替布工坊建立 Instagram 帳號，希望打開年輕一輩的市場；另一組則發揮數位攝影專業，以大鳥街頭、雜貨店等具有地方日常生活感的地點為背景，替布工坊拍攝商品圖，並使用無人機拍攝部落全景，製作布工坊形象影片。布工坊經理看到大鳥部落的空拍影片後特別開心，還特地跟我們要了影片原檔放上臉書分享，獲得了旅外部落族人熱烈回響，她也告訴我們這個影像如何觸發族人們對地方的情感與認同。課程運作的過程中也可以觀察到，在資本主義商品化環境中成長的學生們討論實踐方案時，一開始容易將布工坊僅視為一個「賣包包」的商業體，往往會以此發想各種行銷和推廣的方案，卻忽略了布工坊與地方的關係。兩位老師不斷提醒學生們注意其中「人」與「物」的連結，以及空間的意義：布包固然具有商品性質，但其生產過程承載布工坊成員如何分工及參與；而這個空間及物件的存在，價值取向不只限於外部社群——客戶——購買與否，也透過經營者有意為之的作法，存在於內部社群的互動。李如菁（2022：47）回顧物質文化研究理論時，即引用 Miller 所言，指出人造物件之所以被視為再現文化的媒介，不僅由於其被賦予文化上的意義、與歷史的淵源，也由於它參與了人們自我形塑，了解自我與他人的過程。大鳥團隊欲以布工坊為主題進行策展的想法，便在這樣的思考背景中萌芽。

在規劃展覽內容時，除了基礎的「芭札筏布工坊簡介」，以及展示製作工具，展覽的第二部分為「不只是車包包的人，更是設計包包的人：設計師們」，嘗試突顯出設計師們的形象，將她們在布工坊的身分作為第一個定位；第三部分「在工作與家庭之

間：賦予女性工作者的彈性」則描繪女性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使這個以女性為經營主體的微型事業發展出其獨特的經營及工作分工方式，以此帶出下面兩個單元：「家庭經濟的配合——日常不可少的柴米油鹽」、「工作不只是工作——追劇、訴苦與育兒中心」，呈現這個空間之於女性的意義，以及作為設計師之外重要的第二重、第三重身分：太太、媽媽。策展團隊還手工製作了經理與設計師 24 小時的時間軸，從她們如何分配自己的一天，更具象地呈顯她們在不同身分間切換的樣貌。最後「留在大鳥的堅持」，輔以學生拍攝的空拍圖，標出與布工坊有合作的店家，呈現布工坊座落在大鳥部落內具有的雙重意涵——留在「家」中，同時將自身定位為作為內與外連結的重要節點。



圖 1 「我們不只賣布包：大鳥 Pacavalj 布工坊與地方的多樣連結」展覽

上述架構旨在開展出一個認識空間的層次。對於初踏入布工坊的人來說，第一眼吸睛的除了布包，還有在裡頭迎接客人的「經理」，以及埋頭工作的「設計師們」；而隨著對談加深，會認識到這個空間對於「經理」及「設計師」而言，不只是工作的場所，

也是讓她們能夠與「家」及「地方社群」保持連結的存在之所。這個在當前時間點所見到的連結網絡，並非一蹴可幾，而是在不斷積累的歷程中慢慢織起的。下一節，將自當前這個時間點回溯，以時間線方式，了解布工坊成立的緣由及經歷的故事，再從故事中，看見每一個時期布工坊關切議題的變化。

### 三、災後，內外交織出的社造活動

2009年8月8日，莫拉克颱風挾帶驚人雨量橫掃全臺，累計雨量不斷上修，導致南迴鐵路、公路中斷。隔日（8月9日）是臺東縣大武鄉大鳥村的居民至今仍印象深刻的一天，一整夜從天澆灌而下的雨好不容易稍稍停歇，但土石早已鬆動，自山上汨汨滑下，淹沒過部落最上方的幾戶家屋後，繼續夾帶大量泥水衝進村莊，造成全村有十四戶房屋受土石流淹沒全毀、十一戶半毀、二十五戶有土石入侵，為臺東縣受災程度僅次於嘉蘭部落的地區。其中房屋受損最嚴重的十四戶在同年9月初組織了「臺東縣大武鄉大鳥部落受災自救會」（簡稱大鳥自救會），在部落文化廣場搭起帳篷、架設簡易生活設備、制定生活公約，並由同為受災家戶的王中山頭目擔任對外爭取資源進行家園重建的代表。儘管政府曾想將大鳥災民安置到距離大鳥車程約一小時的臺東市區馬蘭榮家，但他們多數仍選擇繼續住在文化廣場的帳篷裡，直到2010年2月28日，才從住了近半年的帳篷搬進新落成的中繼屋（林慧雯，2010：40-41；王嘉緯，2011：38-40、42）。

天然災害往往來得急促，且不可避免地會對一個地方社群產生衝擊，除了生活環境的變化，既存的文化價值、生計產業、內部組織以及對外的關係等亦面臨考驗。既有的社群狀態如何應對

災後的情境、如何存續或產生變遷，遂成為災後研究的重要主題（邱克偉，2019：14-19）。於政府而言，如何進行地方的災後重建亦是被審視的，而自 1990 年以降，在政府推波助瀾下活躍的社區總體營造運動，成為災後重建重要的方法之一。政府於災後通過的「莫拉克颱風災後家園重建計畫」，除了受災戶安置議題，亦與社區營造概念銜接，希望從生活、生產、生態等面向重建受災的社區（王嘉緯，2011：8；郭瑞坤，2012；邱克偉，2019：19-20）。根據王嘉緯（2011，54-61）的整理，當時公部門將自己定位為社會福利監督者的角色，由民間單位擔任主要執行者，而作為重點扶植點的大鳥村，外部資源在接下來的幾年間接連叩門，不同民間單位湧入，媒合了不同面向的資源，除了物資配送、協力安置計畫、興建中繼屋或永久屋的討論等，也有以扶植地方產業的計畫加入（見表 1）。面對龐大的資源及多元的單位，村民也在與外部團體合作過程中，開始養成對外行動的能量與能力，前述的大鳥自救會即在全數入住中繼屋後，於 2010 年 5 月轉型，成立「笹札筏文化發展協會」，希望以文化為基礎進行接下來的重建之路，並作為與外部資源接洽、合作的主要在地單位。其組織成員架構包含有理事長、總幹事、營造員、青年會會長。

表 1 莫拉克風災後進入大鳥部落之民間組織及其協力內容

單位	資源連結內容
臺東縣南島社區大學 發展協會	1. 物資募集
	2. 社區營造計畫申請輔導
	3. 部落書香園
	4. 成立大鳥樂齡班
台東縣原住民族 全人發展關懷協會	文化創業產業課程
世界展望會	1. 規劃中繼屋興建
	2. 部落青年會所興建
	3. 開心農場
	4. 開設部落縫紉班、訂單媒合
原鄉部落重建文教基金會	1. 文建會小米田復育計畫
	2. 部落書香園
介惠基金會	莫拉克颱風災區生活重建中心：心理服務、就業服務、防災服務、志願服務等
人民火大聯盟	擔任自救會志工，與大鳥自救會成員一同開重建會議、整理相關法規
嘉蘭報告影像紀錄小組	1. 拍攝「大鳥 181 天帳篷日記」紀錄片
	2. 重建會議內容影像紀錄

(整理自王嘉緯，2011)

彼時的箆札筏文化發展協會與外部單位合作，承辦的計畫內容主要有「莫拉克風災重建區原住民文化創意產業計畫」，以及「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莫拉克風災後社區組織重建計畫」。前者自產業發展概念出發，設計工藝創新運用研習課程，以及香茅認識班；後者著重文化扎根，安排一系列排灣族文化課程及青年成長營。其中，時任理事長的王中山、總幹事潘世珍、營造員王曉彤、青年會長林志祥，至今都仍在部落公共事務的不同層面上持續努力，其中王曉彤也在 2015 年轉任布工坊經理迄今，同時也是現任箆札筏文化發展協會理事長。王曉彤回憶身為營造員的日子，她認為外部單位當時的確有做到陪伴與培力的角色，儘管現在布工坊並不依靠政府計畫存續，箆札筏文化發展協會目前也低度運作，但仍有許多與公部門或學校單位合作的機會，而過去的經驗讓她熟悉許多行政流程及核銷概念，也更熟稔於與外部單位的應對。

陳永龍及丘延亮（2014：167-178）指出，在原住民為主要居住者的社區——「部落」——是高於「家庭」的社會組織單元，因此應以「部落再生成」的概念思考部落重建的方法，而非住宅與家戶，進而整理出六項具體重建面向：

- (1) 維生墾殖：在地飲食重建
- (2) 會所營造：心靈生活重建
- (3) 協力造屋：居住安全重建
- (4) 文化產業：創藝生活重建
- (5) 教育輔導：扎根發芽成長
- (6) 社區照護：耆老記憶挖掘

唯「再生成」的概念，並不應該以「營造」一詞蔽之，他們認為必須從日常生活中藉由「共同情感」及「共同意識」的凝聚，激發對「家鄉守護」責任的承擔。「它總在社會組織／社會互動／日常生活實踐中，進行無日無之的社會自為與防護，抵制種種物質的，或文化的假化商品的操作以奪回生活與人群的意義。」（陳永龍、丘延亮，2014：286）意即，部落再生成要成為可能，不能侷限於意象或概念的營造，而是必須進入日常生活實踐面，透過情感層面的凝聚，將之延伸至人對於家鄉／部落的關切之心。

從表 1 的整理中，可以看出各項引介進入部落的外部資源，涵蓋面向的確包含上述六大類別，從耕地開闢、青年會所搭建、中繼屋抑或永久屋搭建的討論、各種工藝及傳統文化課程辦理，到長者樂齡班、兒童書香園的開設等，顯見彼時的大鳥部落在與各民間團體合作的情形下，能夠活用公部門所給予的資源，開啟部落重建之路。而從今日大鳥部落的情形來看，書屋及樂齡班已有所轉化，不再由芭札筏文化發展協會擔任申請公部門資源的單位，而由鄰近地區其他協會組織承接，當時被培養的青年們則在 2021 年自行成立工作室，希望繼續進行青年文化培力。其中布工坊雖內部成員有些許變動，卻是唯一一個持續以芭札筏文化發展協會作為申請資源的主體，並在後來成功轉型為由團體內部成員自主營運的營利單位。

張雅雲（2003）在分析宜蘭白米社區社造活動中女性的角色時，運用 Moser 性別規劃（gender planning）概念進行觀察，提到女性的三重角色：生產者——可產出具交換價值或收入的工作者；再生產者——負擔照護、養育等家務工作者；以及社區經營者——再生產者角色的延伸。意識到女性在一個社會中存在的多

重角色，以及在每個位置的處境，有助於進一步分析在具性別意識的行動中背後所思考的需求。吳鄭重談及女性的社會處境時，即提到需理解在其身體空間上的「制度網絡」，亦即作用在她們身上的多重社會關係結構，以及個人的行動鏈結，他並指出，資本主義社會之所以產生各種問題，原因在於「例行化的個人生活」和「制度化的社會結構」之間的關聯不被重視，許多由上而下的政策方案，往往從政治經濟面的制度層次著手，忽略了日常生活的實踐，也因此，日常實踐反而往往會成為政策實施時的反制力量，使政策無所成（吳鄭重，2019：55、143）。又江以文與林津如（2011）以高雄縣那瑪夏鄉的「女窩」組織為例，探討該組織負責人如何從部落女性個別生命經驗及經濟處境中，找到共同需求，發展出不同面向的計畫執行內容；然而當部落女性從「家庭」（私領域）進入「社區」（公領域）時，亦由於挑戰地方社會既有對女性的認知，以及複雜的家族與部落關係進而衍伸出許多困境。吳孟容（2012）談太魯閣族女性織布從一項在家中進行的傳統工藝，轉變為對外行銷的文化產業時，會面對到的問題之一便是家庭內部成員的緊張關係。

上述種種對於女性與社會政策互動的討論，可見「日常生活」是不斷被提及的關鍵詞彙，而這也正是女性經驗對於公共事務參與經驗所能開啟的不同討論面向。當中央社造資源挹注到地方，催生了許多地方文化團體，其中不乏以女性作為主要組織者的團體，如托育班、舞蹈班、織布班，以及本文中提到的縫紉班等，這些從日常生活出發產生的實踐行動，有別於男性原住民菁英主導的原住民運動，創造出不同的社會運動議題，看似瑣碎渺小，但也更關係到族人的基本生活問題（江以文、林津如，2011）。

下面幾個章節，將透過布工坊成員對於該空間不同時期經營情形的描繪，包含王曉彤經理自述其接手布工坊後發展出的經營策略，以及策展團隊累積的田野觀察，爬梳其在不同階段與外部資源連結的情況。但因本文已將布工坊名稱公開，為尊重內部成員之隱私，將著重王曉彤經理個人參與社造以及布工坊經營的經驗，說明其如何在覺察地方女性困境之後，透過有意識的「共同情感」建立，以及「共同意識」的凝聚，慢慢長出自主營運的力量。

#### 四、從縫紉班開始的聚集：沒薪水領不如回家

2010年5月，世界展望會（後簡稱世展會）投入一專門人力，協助進行地方產業規劃，其中所成立的縫紉班即是布工坊的前身。

大鳥部落大部分婦女都會繡十字繡，但是卻沒有將十字繡設計成實用的生活用品……新學習的技巧可以將部落特色的織布開創成生活中有用的生活用品，也讓部落有心學習的婦女有一個可以互相交流的學習空間，也可以把部落特色十字繡變成實用的包包，成為大鳥排灣族的一個新產業（柯雅璇，2010）。

在過去排灣族社會中，十字繡是婦女必須習得的重要工藝之一，以為自己的親人繡製服飾。在發掘婦女普遍有十字繡工藝基礎情況下，世展會決定創造其可能延伸的經濟效益，於是展開為期三個月的計畫——協助成立縫紉班，提供縫紉機採購、相關

訓練講師及材料等費用，並媒合太麻里「原愛工坊」<sup>1</sup>至大烏村培力婦女們製作布包的技術。由於其中並未包含人事費用，因此當時參與的婦女們都是自發性地抽空學習，並只把這當作是件好玩的事情，大家聚在一起邊車縫些小作品邊聊天，有時候還會煮鍋燒酒雞共食，很是快樂。「那時候老公都會念呀：『妳們在這邊也不知道在幹嘛，也沒有薪水，不如回家照顧家裡……。』」設計師這麼回憶著。2011年，計畫經費持續注入，期程八個月，儘管是帶著產業發展的想像，但地方仍然以業餘性質和婦女們的聚會來看待縫紉班。這樣看似無秩序的開始，沒有人能預料縫紉班的未來會是如何，又會走得多遠。

世展會計畫結束後，縫紉班以「笆札筏文化發展協會」申請「101年度勞動部多元培力就業計畫」，在2012年正式轉型成立布工坊。培力計畫的補助項目更為多元，不僅支持了材料費和空間水電費等支出，更重要的是提供人事費用，包含一位專案經理人以及八位員工，讓參與的婦女們開始領取固定月薪，讓婦女們閒暇時的聚會正式轉為工作型態。這段期間政府會不定期邀請專業輔導團隊給予經營和管理上的協助及建議，設計師們除了製作布包，也要填寫許多紙本行政表單，包括定時上下班的出勤表，以統計出缺勤狀況，人員需填寫每日工作日誌，將工作內容進行量化（如裁剪多少樣布和完成幾個包包等），勞動部區域督導不定期的抽訪也對所有人員的心理形成一定的壓力。另一方面，對作品品質的要求也提升了，據設計師回憶，當時包包做錯會被時

---

1 臺東縣原愛工坊協會下轄原愛布工坊與原愛木工坊兩單位，成立於2007年，由前新興國小校長鄭漢文發起。他期望自部落熟悉的文化技藝中發展出具有在地文化特色的商品，提供在地居民穩定的就業及培力機會，進而讓孩童有穩定的家（整理自臺東縣原愛工坊協會官網：<https://ol780253.weebly.com/2133226371317720171.html/>）。

任外聘的專案經理人要求拆掉重做，而且還會要求她們必須帶回家拆，避免浪費時間。這樣的模式持續了三年，高峰期共計有八人在布工坊上班，其中有一人直到今天仍留在布工坊，而她們也成為今日培訓後進的重要人員。但仰賴公部門補助的問題隨著時間拉長逐漸浮現，布工坊面臨到是否要繼續走下去的議題。

## 五、拒絕政府補助之後，以女性身分「同理」出發的人事管理

林淳華（2012：7-9）指出，臺灣的災後重建，包含家屋重建、心靈重建以及經濟重建，但政策往往略去文化脈絡，且忽視人與地方社會的鑲嵌性。他以大愛村永齡農場為例，說明以工廠生產線模式管理員工，忽略地方居民既有的工作型態，因而宣告失敗。而以工代賑方案或文創類產業的推動常只是短期就業媒合，忽略長期的技能培養，或是因無培力個人／單位如何與市場接合，而讓受助者在政府補助撤銷後反而無所適從。上述也正是布工坊在接受外部資源補助時期面臨的問題，除了工作型態缺乏彈性造成人員上班的疲態，另外則是在民間團體及政府單位的資源進駐之下，訂單多仰賴這些單位媒合，初期依靠著災後「善心」，爾後則端看公部門是否有銷售管道，這些都讓布工坊難以找到自己發展的力量。

生長於大鳥村的王曉彤，為地方頭目家族成員，莫拉克風災前，她先生曾擔任大鳥社區發展協會的理事長，她則是從旁支持的角色。風災後，芭札筏文化發展協會成立，需要一名社區營造員，彼時的總幹事潘世珍找上了她，這是她真正執行公部門計畫的開端。初期她主要協助開心農場的人員管理，以及擔任與其他

外部單位的對接窗口，直到 2014 年她才加入布工坊，與當時由勞動部聘請的專案經理人合作管理布工坊。她回憶自己剛接手時，滿滿的布包堆滿了倉庫，「媽媽們只知道做包，根本不知道怎麼賣包。」這句話道出接受公部門補助下地方培力的漏洞，這些媽媽們一直以來接受的僅有製包技能的訓練，她們產出的包大多經由公部門管道銷售，因此媽媽們從未思考行銷問題。事實上，勞動部也有安排一些擺攤曝光的機會，當時的經理人除了出席會議和培訓幹部，也常常需要參與市集，王曉彤會隨著經理人前往，她也當作觀摩，看別人怎麼賣東西，並在這個過程中意識到自家的布包由於技術習自其他工坊，且長久以來沒有思考外觀設計上的突破，因此無法在眾多攤位中突顯出來。於是透過參與市集的經驗，與客人互動過程中，她開始思考屬於箆札筏的風格到底是什麼。由於許多顧客會詢問這些繡片上圖紋的意義，她意識到必須為這些習以為常的圖紋建構意義。回到部落，她或詢問地方長者，或與布工坊其他成員經由自我文化觀點出發進行詮釋，藉此厚實商品與地方文化的連結，才慢慢走出屬於箆札筏布工坊的特色，不再只是仿效其他工坊的包包款式。

商品的市場定位問題雖然逐步解決，但公部門標準化的工作要求終究與部落習慣的工作方式不符，對內部工作人員造成壓力，制式的上下班時間讓有些人員寧願放棄固定薪資選擇離開，整體運作掣肘，人心難以凝聚。在這個情況下，王曉彤決定自 2015 年起不再繼續申請公部門計畫：「我跟媽媽們說，如果以後月薪只有 3000 元，妳們還願意留下來嗎？這樣說本來是想嚇跑她們，沒想到隔天大家還是都來了。」布工坊成員清一色是女性，她們肩負著家庭照顧的責任，有的要照看小孩，有的要照顧婆婆，這也是為什麼她們無法因應制式的上下班工時規定；但於此同時，

她們仍希望能有一份收入，僅作為貼補家用也好。王曉彤理解她們這樣的心情，因此在人事管理上，開始採取較符合地方節奏的方式進行工作安排。「政府的培力培養了今日的布工坊，堅持下來的設計師都有良好的手藝基礎。但在部落工作不能忽略人情，妳必須了解每個人的生活環境，理解她們的家庭狀況，不是早上八點來、下午五點走那麼制式，要有彈性。」



圖 2 布工坊成員 24 小時的時間軸，呈顯她們在不同身分間切換的樣貌

由於對每位成員家庭及生活的瞭解與掌握，她得以因應每個人的時間及能力協調工作內容；工作採責任制，雖有表定上下班時間，但保有彈性，所以有些人會先忙完家中事務再來上班，也能提早下班回家煮菜，家中孩子或老人有突發狀況都能馬上處理，甚至可以配合照顧家中長輩之需，請一個月的長假再返回工

作崗位，設計師想趁夜晚空閒時段到工坊完成工作也是可以的。因為「同理」的管理模式，當接到大筆訂單時，大家也都願意熬夜加班、全力以赴，甚至連家人也加入協力行列。這種同理與彈性的工作模式，是在外地工作，或是接受政府補助狀態時所無法達成的。

回應了成員身為「媽媽」、「太太」、「媳婦」的需求後，王曉彤又依據每位成員擅長製作的產品，以及個人工作特質，給予不同稱號，如經理、首席設計師、國際設計師、新銳設計師、班長。除了布工坊裡負責設計、縫製包包的全職設計師們，另外還有一群刺繡班媽媽，專門負責繡片生產。王曉彤強調，這些稱謂並不是反映階級高低，而是依據個人特質與能力，對應不同的責任。「進到布工坊後就不能只是媽媽，也是設計師。」她希望透過稱呼的轉變，讓成員們以及部落中的其他人更認真看待「製包」這件事，對內提升責任心及榮譽感、肯定自己的價值與能力，對外是讓村民或來訪者看見成員的專業，並予以尊重。對於這個稱號，工坊成員從一開始的不自在和害羞，到現在的接受，甚至成為了自然而然。走在村莊路上，王曉彤除了原本的名字，有些孩子也會很習慣地以「經理」這個稱呼向她打招呼。

表 2 工坊成員、年紀、資歷、主責事項整理

稱號	年次／年資	負責事項、名稱內涵
經理	60 年次／ 10 年	公關、行銷、財務、布工坊整體營運管理。
首席 設計師	40 年次／ 14 年	年資最長，從縫紉班即參與其中。負責客製包及新款包研發打版、帶領新人。
新銳 設計師	70 年次／ 12 年	精緻小包、導演包製作；因有創意及想法，勇於挑戰新技法，故稱新銳。
國際 設計師	50 年次／ 12 年	所製包款受外國顧客喜愛，並懂得抓住大眾口味，發想製作的包款常一上架即售出。
班長	70 年次／ 4 年	刺繡班聯繫、繡片品質管理、協助備料、簡易包款製作（2022 年起因為照顧家人，暫時轉為刺繡班成員，亦會回布工坊支援）。
組長	70 年次／ 1 年半	承接班長工作，負責刺繡班聯繫、繡片品質管理、協助備料。近期開始獨立製包。
刺繡班 媽媽		布工坊手工繡片

(楊濬瑄整理)

儘管透過不同的稱號為每位設計師定位，但其實設計師在工作上相互支援的狀態，她們都經歷從刺繡、備料到獨立製包等完整的學習流程，並熟悉每一個包款的製作方式，如此一來，當有人請假時，其他人仍可以協助填補她的工作項目。有人請假對布工坊而言是常態，有時成員因為要照顧家中長輩，或是幫孩子

準備婚禮等雜事而請假長達一個月，也有成員為了幫忙自家店鋪生意，下午才進布工坊上班。這些因家務事伴隨的缺席及彈性工時，經理表示薪水仍會照發，且薪資眾人一致。這種一律平等的給薪制度曾引起過抱怨，但隨著「每個人都會有需要請假的時候」、「布工坊也有突然需要大家加班的時候」如是共識的養成，互助默契便慢慢形成。

在排灣族的社會組織中，確有這樣各司其職的概念，撒古流在《祖靈的居所》一書中提到，以頭目、貴族、平民來稱呼排灣族社會組織中不同的角色容易被誤解為金字塔式的階級關係，但其實更應以「同心圓」來理解排灣族的社會關係，因排灣族人「沒有階級上下、地位大小之分，是依照部落傳統分權分工，各擔起賦予的責任。」當平民將資源交給頭目，頭目並不據為己有，而是以各家戶是否需被照顧為考量，進行資源的再分配，可謂眾人以集體的力量共同維繫部落的運行，成就「圓」的存在（撒古流，2013：22）。

## 六、布工坊女性與家庭

布工坊女性成員的年齡層介於 30-60 歲之間，跨越世代的她們皆由於「照養長輩」的責任返鄉或留鄉，與經理及設計師聊起日常生活時，「婆婆」、「孩子」、「先生」是言談中最常出現的詞彙，她們的先生目前也都一起留鄉，在鄰近地區工作，共同分擔這份家庭責任，但先生的工作時間相對無法彈性。以布工坊的薪水收入而言，設計師們表示尚可支付諸如瓦斯、水電、菜錢等家用日常開銷，雖無法作為家庭的主要經濟來源，但布工坊彈性的人事管理制度，讓她們能就近照顧生病的長輩，或是將年幼

孩子帶在身邊工作，對家庭或是整個家族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支持。但是否留下來任職，仍受多種因素交織影響，新銳便曾為了幫忙老公的工作離開布工坊，也有人因為對布包製作感到些許疲乏，轉而尋覓其他鄰近的工作機會。對於選擇離開的婦女，經理仍會在有大筆訂單時找她們回來幫忙，「這樣也可以維持她們的手感，而且她們若願意幫忙，也代表有回歸的機會。」後來新銳也的確再次回歸，她說：「這裡的時間還是比較能讓我跟孩子相處。」

每一個布工坊的布包上，都搭配不同花紋的繡片，又可分為手工繡片和電繡繡片兩種。其中手工繡片是由刺繡班成員製作。刺繡班成員同樣為部落的婦女，成員多為年輕的媽媽，利用在家照顧年幼孩子的空檔進行刺繡工作，也有些婦女將這當作是正職以外賺取額外收入的方式。班長會定期檢查庫存狀況，計算所需圖樣數量後分配給刺繡班成員，成員們至布工坊領取相關材料回家繡製，完成後再將成品拿到布工坊，經班長仔細檢查以確保品質，沒問題後再由經理計算及給付工資，工資則依圖紋難易程度有所差異。最基本的圖紋有五種：公主繡、蛇紋屬較簡易的樣式，山形紋、大花紋及人形紋則較難。有時候刺繡班成員會自己設計圖案，拿給經理參考是否合用，成為獨特的設計款。

對刺繡班成員來說，在班長提醒的時間內完成工作就可以拿到現金工資，是很實際與安心的，她們並不清楚布工坊銷售及營運狀況，也不受其業績影響。以布工坊的角度而言，即便有銷售不理想的時期，經理仍會要求班長必須持續維持繡片的產出，這個做法除了是要因應可能突然出現的大量訂單，另一個原因是，「一旦妳沒工作給他們做，她們會轉而找尋其他機會，等妳有需要時，她們就不見得有空接妳的單了！」刺繡是份耗眼力的工藝，

因此年長者多半無法負荷，村子裡頭有能力並願意承接這份工作的年輕人力又相當有限，某次布工坊接到製作一場大型會議伴手禮提袋的任務，數量超過百件，繡片庫存量瞬間不足，經理急需更多人力投入繡片的生產，在大鳥卻找不到更多人能協助，只好往其他地方尋找人力，範圍遍及鄰近的加津林部落和土坂村。在工作機會有限的南迴地區，大家會把握各種機會，臨時工或短期就業都好，面對這樣型態的工作模式，布工坊必須想辦法維持既有人力資源，方能確保自己運作無虞。而另一個原因，或可從班長的故事來看，班長在 2022 年時因家中長者身體需要較貼身的照顧，因此從布工坊的正式員工轉回刺繡班，對她來說，這是一個能兼顧家庭與持續有經濟收入的方式。有幾次筆者想找班長出來聊聊天，她都希望由經理轉達，筆者才發覺家庭賦予她的責任因而形成的壓力可能不小，布工坊的工作和空間成為她暫離家務壓力進行喘息的「正當」理由。

## 七、留在家裡

隨著布工坊的知名度日漸提高，許多單位團體慕名而來，參訪的客人開始期待對大鳥部落能有布工坊以外更多的認識。隨著訪客停留時間的拉長，進而延伸出導覽、風味餐和住宿的需求等。經理開始擔任「媒合」的角色，她知道誰的文化知識豐富、哪一戶釀的小米酒好喝、哪位 vuvu 的廚藝好，某家餐廳量能充足，她更聯絡有閒置空屋的屋主，打造接待家庭，提供遊客住宿。她運用自己對地方的熟悉，進行適當的安排。經理對於自己的工作模式，常會以身為「頭目家族」一員所需肩負的責任進行詮釋：「可能天生就留著這樣的血液吧，很自然覺得自己要在第一線面

對問題。資源要懂得適當分配，讓每個人都有感，才能讓人信服……。」

公部門曾建議布工坊將基地轉移至大武市區，在一個更為便利且空間更大的場所經營，以容納更多成員，擴大生產規模。但是，布工坊的空間若從大烏轉移至他處，意味著婦女們得離開村莊工作，必然失去就近照顧家庭的功能，彈性工時與產品數量等也會受到檢視，布工坊與其他地方產業的連結也會斷裂，這些狀況或許會讓布工坊回到申請公部門計畫時期的窘境。因此，布工坊仍然選擇留在原地，在那個大家步行就能到的地點，在一方約莫 10 坪大的空間中運作，對所有人開放著——「先把家顧好，才有心力做好工坊的事。」王曉彤常把這句話掛在嘴邊，家與布工坊，是相依而存的。

## 八、內與外的調和：從女性日常生活出發

對於女性多重身分的共識，成為布工坊所有運作思考的基礎；重新檢視布工坊的發展歷程，在其座落的大烏村，多重的社會制度在此交織——內部排灣族群對家族關係的重視、家庭分工的調和等。布工坊結合對外部資源的需求，在內外體系交織之下逐步彙整出一套經營方法，其歷程大致可分成三階段：

第一階段為縫紉班的現身。對地方來說這僅是婦女的日常業餘活動，是眾人在家庭與工作之餘，聚在一起的學習場合，比起產業經營，更可被視為災後某種心靈上的重建，外部單位在此階段以「重建」概念導入社區營造的方法，並以陪伴角色的方式協助各種行政作業以及資源的爭取。

第二階段，笆札筏文化發展協會成立。透過申請補助將縫紉班轉型成笆札筏布工坊，婦女們成為有收入的員工，在官方制式的流程中逐步建構出一套製包作業流程，並依照固定上下班的制度進行人員管理。這個轉型除了工作地點仍在部落空間，其他的轉變對於成員而言都是需要適應的。總體而言，量化的工作模式讓各個工作項目被細化檢視，形成日復一日的製包循環，如此的生產模式某種程度也像極了在工廠生產線中勞動異化的狀態，這樣的模式加劇了成員們的疲憊感。又，這份「工作」常常會被打斷，由於婦女們仍被視為留在部落照顧家庭的重要成員，她們說，老公或家裡的人偶爾還是會騎車繞過來看看她們在幹嘛，或打電話來希望她們回家處理事情，這無疑地為婦女們多加上一重壓力。

第三階段為停止申請公部門計畫補助階段。經過前一時期建構的作業流程，從刺繡、打版到縫製與收尾，這些分工作項目並不特定落在誰身上，每個人都相當熟悉流程。這個階段最大的轉變，是讓擔負家庭照護重責的婦女們能擁有更大的時間彈性，讓她們可以較為自由地分配各種因家務而被切斷的零碎時間。另外，她們也發展出另一種與地方互動的模式，讓布工坊的角色不僅限於產業面，例如每年開學季前，設計師們手邊的工作都是製作鄰近小學的書包和幼稚園的便當袋，長期下來，成為了一種「入學傳統」。經理本身也擔任鄰近某些國中小學的文化課程講師，並帶著設計師們一起到學校進行十字繡教學，有時候她甚至會讓設計師單槍匹馬上台教學，於無形中養成設計師們另一項能力——教學，同時也為布工坊設計師的身分創造更多的價值。除此之外，在部落各種場合，舉凡婚喪喜慶、國小運動會、收穫祭等，布工坊的成員也都會以團體之姿現身，準備一場表演、包一包紅

包、出一個攤位……，對於公共事務參與不遺餘力，種種有意為之的現身，都是在形塑布工坊成員的一體感，也為布工坊創造出與地方更深厚的連結。

Lefebvre 指出，要進行社會變革，首先必須回到「在經濟、政治社會與文化宰制中最為隱蔽也最普遍的日常生活」，他認為日常生活是制度面與個人行動面最大的交會處，回到對日常生活的覺察與批判，便可以發動「日常文化革命」。（吳鄭重，2019：150）然而，從前面章節的爬梳中，可以發現負責人力管理的王曉彤，她並沒有發起「革命」之意圖，採取的方式並非全然的批判制度，而是有意識地發掘制度與地方日常生活矛盾之處，再嘗試去達到兩者間的調和，這看似服膺了女性作為家務主責者這樣不合理的潛規則，不斷強調「家」的重要性也繼續強化女性在其中肩負的壓力；但有趣的是，當她回應並滿足了「家」這個對地方女性而言難以割捨的生活基礎，反而讓這些女性成員有了一個喘息以及與家人協商的機會。這類似 20 世紀女性主義作家 Virginia Woolf 在《自己的房間》（*A Room of One's Own*）所倡議的——女性都需要擁有自己的房間，和一筆屬於自己的錢，如此才能挑戰加壓在其身上的制度。布工坊不是個人的或私密的，但這個空間由女性所主導，布工坊是她們可以集體自在對話的環境，同時也是工作場域，讓她們在這裡的所得可以轉化為經濟資本，去與家中的人協商如何分擔家務，暫離她們需要處理各種雜事的「家」。而稱呼的轉換，布工坊之外的「媽媽」，布工坊之內的「設計師」，也是一種讓她們抽離家庭身分的一種形式。這裡像是一個女性聚會所，是一個留在家，但也不在家的空間，卻完整了她們對於「家」的想像。

## 九、展覽活動：同時是向內也是向外的對話

東大人社團隊與布工坊的接觸，一開始是從課程合作著力，希望能讓學生透過課程參與了解原住民族當代社群樣貌，認識地方經濟發展的多元路徑，這樣的行動是希望向地方學習，但我們也不斷思考，除了向地方學習，還能夠如何加入布工坊不斷成長的環節。「我們不只賣布包：大鳥 Pacavalj 布工坊與地方的多樣連結」這個展覽，是「向地方學習」的延伸，而展覽活動的設計，則是我們參與布工坊地方行動的方式之一。展覽地點在臺東大學圖書資訊館一樓，這裡除了是校內師生重要的活動區域，也由於東大圖資館曾被票選為全球八大特色圖書館之一，且於 2019 年榮獲全球卓越建設獎，有不少國內外團體或遊客會專程到訪。加上東大人社團隊的組成除了考量不同學院和科系的教師參與之外，也兼顧行政團隊的協力，人社團隊成員包括圖資館館長的謝明哲老師、讀者服務組組長的葉淑綾老師，固定每兩週開會討論的人社團隊也成為校園內不同學院和不同組織之間推動內部溝通的重要平台。大學與地方相互學習共作而成的「我們不只賣布包」展覽和後續活動選在圖資館進行，不僅在校園內向師生傳達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的理念，也向到訪的遊客介紹臺東在地大鳥部落與布工坊的精彩，更是我們持續參與地方行動的策略。

展覽於 2020 年 9 月 24 日開幕之後，我們與布工坊經理王曉彤商量在東大辦一場活動，邀請設計師及其親友參與，希望藉著這個方式讓學生認識布工坊獨特的經營模式，也同時能讓大鳥親友們更了解布工坊的運作狀態。這個發想源自於我們在部落所聽到的一些耳語，一開始認識布工坊的我們，看著布工坊設計師們埋首工作、架上擺滿她們做的漂亮布包，王曉彤經理總是精力充沛的迎接每個走進來的客人，總覺得任誰都會肯定她們的努力。

然而，儘管成員們的配偶多已對這份工作抱持肯定的態度，但部落裡頭仍有許多人抱持懷疑態度，認為她們「不需要曬太陽」、「還不是有拿補助」，這些評語來自於布工坊自公部門補助發跡，如是背景產生難以被抹去的印象。透過這些耳語，我們明白到這份工作對於地方的人們而言仍有許多待了解的面向，而要有所突破，我們的選擇是帶著親友們到一個他們相對陌生的環境，聆聽與看見「他者」如何說布工坊的故事，藉他者的視角，讓親友看見布工坊創造的意義與價值。

2020年11月4日當天，布工坊的設計師們除了新銳因家中有事外，其餘全員到齊，另邀請約11名親友一同前來。流程設計分別針對布工坊成員、親友團以及學生三組進行不同安排（表3）。以下針對活動當天情形做概述。

表3 「我們一起完成一個展」策展交流活動流程表

時間	布工坊成員行程	成員家人行程	參與學生行程
9:00-13:00	車程、用餐		
13:00-13:20	報到		
13:20-13:45	開場、策展概念簡介		
13:45-13:50	布工坊設計師走秀		
13:50-14:50	經理 talk show	圖資館巡禮、 野餐	經理 talk show
14:50-15:00	QA 時間 + 好禮放送		QA 時間 + 好禮放送
15:00-15:30	手作時間		
15:30-16:00	茶會、觀展	茶會、自由交流	
16:00	有緣再見呦		

到達學校後，到訪的大鳥部落族人先一起在校內的南島咖啡廚房用餐，再移步至活動會場。活動首先由葉淑綾老師及李建霖博士後研究員開場，說明展覽策劃概念，接著介紹布工坊成員出場，出場方式即是大家一起討論的走秀橋段——布工坊成員們穿著印有自家 logo 的深藍色制服，拿著各自近期製作的包款，隨主持人的介紹，依序踏步走至台前。過去任何對外部單位的活動，都是由經理現身，設計師鮮少露面，為了讓總是坐在機台前縫製布包的設計師們被看見，又考量她們在公眾面前較不擅言詞，才以「設計師走秀」概念邀請她們上舞台，除了經理王曉彤，布工坊其餘四位到場的設計師們都是第一次以這個身分站在舞台上面對陌生觀眾，短短一段路，台步走來仍顯生澀，臉上掛著靦腆笑容。走秀後緊接著是經理 talk show 時間，王曉彤強調女性集體力量的核心概念，讓聽講的同學們了解布工坊經營的模式，以及女性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Talk show 的同時間，我們將親友團帶離活動會場，轉而前往圖資館大廳參觀展覽，親友團成員雖也是大鳥部落族人，卻不見得對布工坊的作業模式熟悉，透過展覽解說，算是第一次完整了解製作一個布包需經歷的繁複程序，和布工坊空間經營的模式。參觀完布工坊的展覽後，圖資館員又帶著家人們參觀館內環境，由於有部分長輩們的孩子在臺東大學唸書，或者有期盼孫子至此就讀的，過程中可以感受到他們都相當興奮。到達圖資館最上層時，遠望著臺東市區，長輩甚至分享各自的臺東記憶。結束圖資館巡禮，來到圖資館旁的靜心湖畔，內心其實早有盤算的他們趕緊從包包中拿出早已準備好的飲品與食物，大家開心地野餐聊天。待湖畔講堂的 QA 時間差不多要結束時，我們才又趕緊招呼親友們返回講堂內與學生一起 DIY。

將親友們帶離活動會場，到帶回會場的時間點，實經過特別考量，經理 talk show 是一個由王曉彤對「外」的演說，她的演說於親友而言也是一場對「外」的展演，因此我們將親友帶離，讓他們進到展覽區，看「外人」如何訴說他們「內」部的故事。事實上，在接駁車自大鳥往臺東大學的路途中，說明當日行程概略時，一位長輩便喊著：「我們沒有要聽曉彤上課喔！」於是我們趕緊說明有為他們安排其他行程。這個其他安排，是因為我們明白，與其讓他們聆聽經理怎麼聊布工坊，不如讓他們看見我們「外人」是如何透過展覽述說和呈現布工坊。至於讓親友們參與手作環節，是希望他們能體驗設計師們的日常，即便只是一個看似簡單的束口袋穿繩和串珠步驟，實際上需要極大的專注力，也是個考驗眼力及耐心的過程。設計師們穿梭在整個會場進行教學，學生之間也邊做邊分享自己的小技巧、相互協助，其中有幾位比較快完成的學生甚至主動到大鳥長輩們的身邊協助串珠。這些過程親友們後來回味起來依然津津樂道，即便多年後的今天，他們依然不時會提起自己「當大學生的一天」。

而那日最忙碌的設計師們，則由李建霖博後趁著最後的茶點交流時間帶她們前往圖資館內參觀展覽。從原本僅從照片觀看，到真正看見圖資館展場的展示，設計師們看著展板上的自己，嘴上還是嚷著「我可以更好看啦！」嘴角卻有藏不住的笑意。原本熟悉的日常工作狀態、常用的工具物件，和精心製作的經典包款被呈現，她們說這是很奇妙的感覺，表示不知道原來大家有興趣看這些。

這場活動，團隊定位為「見習與分享」，希望一方面讓臺東大學的學生認識產業如何奠基於地方慣習，發展出獨特的運營模式，了解經濟發展的多元樣貌，另一方面，則期待透過活動流程

設計，回應我們在田野觀察及聆聽到的議題。布工坊在外的講座都是由經理出馬，設計師則留守布工坊，埋首做包，這場活動是她們第一次踏出布工坊聆聽經理如何講述布工坊的故事，因此我們希望透過展覽以及與學生的互動，讓她們看見自己工作的獨特性，讓外部肯定的聲音傳達到她們心裡，而不是只用賣出多少布包來衡量自己的工作價值。對被邀請前來的親友們，長輩們邊聽著導覽，一邊忍不住回應「我也會刺繡喔」，這帶著「我也很會喔」言下之意的發聲，也正是對於這件事本身產生肯定之意，更有長輩透露自己也曾參與刺繡班，但因為眼力下滑而慢慢退出，還有的長輩小聲的說「原來這麼複雜喔……」。DIY 環節的參與，則讓他們有機會體驗布工坊的工作內容，那時的我們也期許，今天過後，布工坊於這些長輩甚至更多的大鳥族人而言，就不會是個「只是坐在室內不知道在幹嘛」的存在。

## 十、小結

一路走來，布工坊經過許多單位的協力，因此本篇文章以布工坊為主體，談其如何透過不同層次的內外調和，得以在不接受公部門補助的情況下持續營運。大鳥部落自八八風災後面對多個民間團體的進駐，讓族人們開始進行內部資源盤點和對外發聲，並在這些團體陪伴下與各種公部門計畫案接軌，進而了解與公部門配合的各種鈍角（mê-kak），布工坊即是在此背景下誕生，開始了與外部公家單位的磨合。公部門加諸的各種規範，以及對量化數據的要求，讓內部成員覺察到這種模式並非經營的長久之道，因此開始審視內部真實需求，過濾出合適與不合適的運作方法，才達到今日穩定的自主營運，甚至不斷從自己的特色中長出

各種與地方連結的方式。東大人社中心大烏團隊於 2019 年開始與布工坊接觸，初期以課程合作方式，帶領學生前往參訪和進行初步的田野調查。經過頻繁的接觸，我們一開始從物質層面觀察，拚湊出布包從刺繡、版型設計、布料剪裁到車縫的製作流程，到後來逐漸發現整個運作，以至工作如何分配的每個環節，都鑲嵌著布工坊各個成員的生活節奏在裡頭，這也是布工坊運作的特色所在。而當女人的手作力成為具經濟產值的產業，部分村民不甚理解的聲音也隨之而起。

即便布工坊對外已建立出所謂「南迴 LV」之名，卻開始面對部落的各種耳語。由於對布工坊工作內容感到陌生，在地方上有人調侃「她們也不用曬太陽就有錢賺……」，也困惑於布工坊的工作為何可以產生經濟效益，並多半會歸因於「拿到很多補助」這樣的說法上。加上布工坊作為地方一個相對穩定存在的團體，當外部單位有任何想與地方接洽、合作的方案時，第一個找到的一定是布工坊，這的確會使人吃味；但同時，他們也都無法否認布工坊的確是部落想與外部單位合作時最佳的組織。

面對地方上許多質疑又矛盾的聲音，經理對內力求增強成員們的凝聚力，除了逐步讓大家都能理解彈性工時下每個人工時不一，但薪資同酬的情況，另一方面她也在成員因為面對一些家庭狀況，成為村莊話題時，告訴大家：「自己裡面的人有發生什麼事情，我們自己人不要很像看好戲地去議論。我們是一起的，這樣才可以面對外面的聲音。」她非常有意識地從每件小事中找到凝聚布工坊內部的方法，不斷地提醒成員「大家是一體的」。在布工坊年度聚會時，經理也會邀請成員的家人們一起參加，繼續強化「家」與布工坊的連結，並希望這個出自「家」的力量，可以再延伸至「部落」。前文曾提及布工坊積極參與各種地方活動，

如母親節、運動會等，經費與獎品贊助絕不缺席，又舉凡婚禮、文化活動等，經理與設計師們常會以「團體」之姿出演節目。不論對內或對外，這些都是有意為之，除了這樣以團體名義的活躍，的確讓布工坊內部成員達到「共同意識」的建立、「共同情感」的凝聚，將布工坊自身的邊界感強化，也希望透過「公共」事務的參與，將對這份地方產業的認同感擴散至布工坊成員至親們以外的族人心裡。

讓我們再次回顧陳永龍及丘延亮（2014：167-178）所言，在原住民的社會，家與部落是不可分割的存在，而這個說法，可體現在經理思考布工坊之於家、之於部落關係的經營策略上。她首先照顧內部成員與家的關係，又在產業面相對穩健的情況下開始走向自我社會實踐，不追求規模擴大，反而開始著重在與部落關係的經營。猶記最初選擇展覽地點時，我們考慮過借用部落某個空間進行展示，但在與經理討論後，彼時的她認為時機尚不成熟，擔心這樣的展覽會太高調，引起更多人對布工坊側目。經理的擔憂，說明了她期盼布工坊與部落的關係不再有距離的隔閡和內外之別，而是希望能獲得部落的認可，並能一起成為一致對外的存在。

實踐作為一種擾動地方的方式，不一定是將實踐地點設置於「部落」這樣的地方尺度，也可以讓地方尺度擴展，或以創造支持連結點的方式進行。我們如同布工坊先前合作過的單位一樣，透過了解在當下的時間點，適合地方的發展是什麼，地方需要的培力為何，依循地方步調著手進行適度的合作。在我們設計的活動中，邀請布工坊經理、設計師以及其親友們前來臺東大學，有人此行是講師，有人當作「一日大學生體驗」，帶著不同身分前來的他們，跳脫出自身熟悉的生活空間，在和與會大學生的互動中，布工坊成員以不同角度肯認自己習以為常的工作內容，親友

們則有機會接觸對他們而言其實陌生的工作內容。整體活動的構想，是創造一種在場域日常生活中難以達成的對話空間與連結，這項連結是在場域之外另闢蹊徑，並非按照慣常的做法將大學方帶進場域，而是相反的，將場域方拉入大學，一種以脫離日常來反觀自己日常的體驗。

活動結束，我們明白這只是眾人的暫時交集，當村民回到各自的日常生活節奏，他們與布工坊的連結可能仍然有限，但這一趟脫離日常軌道的小旅行，算是打開理解的第一步，而這個推動不見得容易從內部進行，反倒是自外部推一把較能有些許效果。誠如王曉彤經理有時候感慨地說：「我們說再多都沒用，外面的人講話有時候比我們自己人講話更有力。你們肯定我們，他們（村民）好像也覺得與有榮焉，也會（對我們）多一點肯定。」楊弘任（2011）以為，社區營造是一種有效地「挪用」並「昇華」地方網絡，促使在地行動者可進行「邊界維繫」與「社會改革」的雙重行動，兩種力量會持續擺盪、相互編織，前者力量過大可能造成社造被體制所囿限，後者力道過猛則會造成失去在地動員力。從布工坊的例子來看，其內部成員持續透過各種日常的實踐——相互體諒各自的家庭狀況、職稱的建立、以團體之姿參與各種地方活動，無形中維繫並強化了成員們的一體感，進而增強此事業體運作的穩定度，這份穩定也賦予成員們一定的力量去與自己的家庭對話。只是，布工坊並不止步於此，它正試圖找到能夠「昇華」其地方網絡的方法。

這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從布工坊的例子中，可見此過程是自災後開始長出的力量，除了災後地方環境的瞬間變化及生活衝擊，促使地方迸生出一股能量，據此與外部對話爭取權益，其中可見有許多公部門及民間單位的身影，而每一個單位的加入，都

成為促成這個「社會變革」力量之一：不管是世展會經費與訂單上支持初期縫紉班的運作、南島部落大學在公部門計畫申請與執行上行政面的協助，到後來勞動部就業方案的挹注等等。儘管過程中不時有磨合，或因為制度壓力造成的人員動盪，但布工坊主事者也都能夠在過程中不斷覺察不同力量對內部成員造成的影響，而能夠從中培養、提煉出地方自身的能動性，因應每個時期的問題。即便現在看似是穩定自主營運的狀態，隨之而來的訂單壓力與各種營銷收益考量，都讓「產業」與「家」之間的連結需要更大的能量去支撐，比如 2023 年部落收穫祭時設計師們仍然必須輪流在布工坊趕工製包，無法完整參與收穫祭這件事，還是讓這個問題逐漸浮出檯面。不過，身為在這個階段與布工坊接觸的單位，這四年來看見經理一直透過不同方式努力讓這份產業不只是採經濟取向，而是透過各種公共事務的參與、公益或教育面的投入，讓布工坊的邊界能夠擴大，使這個產業能夠成為部落整體認可，並視為需守護的一環。而這，正是我們持續思考能夠如何加入，共同努力實踐的方向。

## 參考書目

- 王嘉緯，2011，《莫拉克風災後臺東大烏災區的社區重建與社區營造》。臺東：國立臺東大學社會科教育學系碩士論文。
- 江以文、林津如，2011，〈原住民婦女組織的培力經驗與運動意涵：邊陲主體如何發聲？〉收錄於何明修、王秀幸主編，《社會運動的年代：晚近二十年來的台灣行動主義》，頁 399-445，臺北：群學出版。
- 吳孟容，2012，《我織故我在：花蓮縣秀林鄉太魯閣族女性工藝編織者之文化生產》。花蓮：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碩士論文。
- 吳鄭重，2010，《廚房之舞：身體和空間的日常生活地理學考察》。臺北：聯經出版。
- 李如菁，2002，〈物質文化研究文獻評述〉。《設計研究》2：45-52。
- 林淳華，2012，〈社會團結經濟與災後產業重建：Karl Polanyi 觀點的取徑〉。取用日期：2023 年 9 月 10 日，檢自：<http://www.atss.org.tw/download/2015E4-1.pdf>
- 林慧雯，2010，《雨驟水急，山的子民何去何從？以八八風災後的大烏部落為例》。臺東：國立臺東大學區域政策與發展研究所公共事務管理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 邱克偉，2019，《災後社區重建與社區營造——以台東縣金峰鄉嘉蘭村為例》。臺東：國立臺東大學進修部公共與文化事務碩士專班論文。

柯雅璇，2010年11月3日，〈大鳥部落婦女：我們還是要走出八八〉。取用日期：2021年11月16日，檢自：<https://www.88news.org/posts/8077>

郭瑞坤，2012，《大規模災難災後重建社區營造機制之研究》。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委託研究計畫報告。檢自：<https://ws.ndc.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hZG1pbmlzdHJhdG9yLzEwL3JlbGZpbGUvNTY0NC8zMjc5LzAwNTg5NjFfMS5wZGY%3D&n=MjAxMjA5MDUxNDM5MDQ1NzM0NzAyLnBkZg%3D%3D&icon=..pdf>

張雅雲，2003，《穿起木屐上班去——白米社區女性的性別與空間實踐》。花蓮：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碩士論文。

陳永龍、丘延亮，2014，《防天災禦人禍：原住民抗爭與台灣出路》。臺北：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楊弘任，2011，〈何謂在地性？：從地方知識與在地範疇出發〉。《思與言》49(4)：5-29。

臺東縣原愛工坊協會，「來自土地愛的呼喚」。取用日期：2023年2月28日，檢自：<https://ol780253.weebly.com/21332263713177720171.html>

撒古流·巴瓦瓦隆，2013，《祖靈的居所》。屏東：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園區管理局。

# Women's Empowerment in Community Reconstruction after Typhoon Morakot: The Pacavalj Fabric Workshop Experience

Chun-Hsuan Yang Shu-Ling Yeh\*

## Abstract

Pacavalj Fabric Workshop—, situated in Daniaw village, Daren Dawu Township, Taitung County—was , initially emerged as a handicraft learning community formed after Typhoon Morakot in 2009 with the formed by the support of various governmental and private resources after the damage caused by Typhoon Morakot in 2009. Today, it has evolved into a workshop renowned for its sale of handmade sewn fabric bagsbags and, mainly operated by women. Beginning in 2019,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s Research Center for Humanity Innovation and Social Practice (RCHISP) initiated collaborative courses and joint curation with the workshop. Through these exhibitions, we began to learnlearned about the external connections of the workshop . “External” can be refered to entities beyond its boundaries, including individuals, community groups within the village, and external outside organizations.

This article starts with the exhibition content, delving into the experiences accumulated by the workshop over more than a decade. It

---

\* Chun-Hsuan Yang, Graduate student, Ph.D Program in Austronesian Studies,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Shu-Ling Yeh,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and Cultural Affairs,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E-mail: E-mail: rainsyl@nttu.edu.tw

explores the dynamics of interaction and fluctuations in resources within internal and external social networks. The focus is on how the workshop adapts its operation strategies between internal and external domains based on time and local conditions. This process aims to foster a shared consciousness and mutual emotions internally, facilitating not only the workshop's independence but also empowering its members to switch between different roles at home and work—an evolving manifestation of female strength. In the current phase, the workshop actively participates in local public affairs, expanding its connections within the community. As a university entity involved to support the workshop's goals during this period, RCHISP put these concerns into designing an exhibition and held an interactive event on the campus, involving workshop members, their families, and university students. This was a way to involve the university in the empowerment of women emerging from the everyday life of this community.

**Keywords:** Pacavalj Fabric Workshop, Daily Life, Social Practice